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Liu Daoyu, an elderly man with glasse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portrai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red rectangular block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刘道玉 著

大学的名片

——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

DAXUE DE MINGPIAN
WO DE RENCAI LINIAN YU SHIJIAN

湖南教育出版社



大学的名片

——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刘道玉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 - 7 - 5355 - 6332 - 3

I. 大… II. 刘… III. ①大学生—人才—培养—研究
②高等学校—学校管理—研究 IV. G645.5 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6985 号

大学的名片

——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

刘道玉 著

责任编辑：龙育群

责任校对：李黎峰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http://www.hnepi.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228411705@qq.com

客 服：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0×1000 16 开 印张：19.5 字数：292 1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978 - 7 - 5355 - 6332 - 3

G · 6327 定价：33.2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新华社于1981年8月21日，曾向全国发出过一条十分引人注目的通稿：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位担任重点大学校长的人，也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时值三伏酷暑，这则消息就像炎热的盛夏一样，显得有些火辣辣的味道。无疑，我被逼到了火炉上烧烤，虽然我不愿意做官，但我已没有退路了。尽管我对这个任命采取了十分低的姿态，但说实在的，当初我心里还是有点胆怯的。论年龄尚不到“天命之年”，论职称我仅仅是个讲师，月薪只有65元。在教授林立、藏龙卧虎的重点老校，这无疑是一种“倒置型”的领导结构。我内心里思忖着：我能领导好这所重点老校吗？我清楚自己不利的条件，但是光想这些不利因素又有何用呢？于是，我换了一种思维方式，不如想想自己的长处，兴许还能鼓舞自己的勇气。我出身在农村，不怕吃苦，能像牛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我不想做官，不怕丢掉乌纱帽，对自己认定的事敢作敢为；我崇尚创新，励志改革，敢于走新路；我在教育部担任过高教司司长，比较熟悉高等教育学、教育政策和教育规律。于是，我增强了信心，怀着振兴武汉大学的抱负开始履行一个大学校长的职责。

我心里十分清楚，虽说我只是一个讲师，但是一个校长的威信和成功与否，是靠他的领导、组织和管理能力，是靠他的决策和创新能力，是靠他独特的办学理念，而不是他的职称、学衔和专业知识。所以，从履行校长职务之始，我就钻研古今中外教育名著，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办学经验，深入教学与科研第一线，勇于改革探索，总结广大教师和学生教育改革中的首创经验，亲自抓典型，以点带面，指导全校教育改革一环扣一环地深入发展。

从大量的教育改革实践中，我逐步总结出了自己的教育观、人才观和

学生工作观。我的教育观是：教育是国家的一项公益事业，他的任务是向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合格人才，为未来社会发展储备新理论、新思想。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项基本任务，教学领域的改革始终是学校各项改革的中心环节，实施创造教育是大学的最高目标，并按此要求全面改革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素质，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的人才观是：尊重学生的志趣，维护学生的选择权，保护学生的个性，坚持德、智、技、群、体、美六育并重，培养多功能性的创造性人才；育才不“愚”才，爱才不“碍”才，求才不“囚”才，敢于保护有争议的人才。我的学生工作观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他们既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又是依靠对象，既是学生又是先生，既是教学改革的参与者又是教学改革效果的实践检验者。

既然学生是大学的名片，那么作为一校之长，就要十分珍惜这张“名片”，千方百计地精心制作这张“名片”。为此，在我任副校长和校长的长达15年期间，围绕着学生的成才这个中心，我花费了许多心血。我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与他们通信、对话，与他们交朋友。我认为，这样做是使我思想不至于僵化的的主要原因，是激励我改革、开拓和创新的动力。

为了保持我与学生之间交流渠道的畅通，我曾对校长办公室约法三章：凡是学生写给我的信件或建议，不得扣压；凡是学生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合理的，必须件件落实；凡是学生要求见校长的，不得挡驾，尽可能做出安排，因为接待学生始终是一个校长应尽之责。除了在办公室、家里会见学生以外，任何一位希望向我倾诉的学生，都可以在我上班的路上等候我，我会认真地边走边听取他们的意见或者另外约定时间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那时有一句时髦的词汇叫“代沟”，即不同年龄段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思想观念差异。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和大学生们不仅没有代沟，而且我们都成了朋友，甚至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至今仍然是我的忘年交朋友。在我任职期间，虽然我在学生成才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但围绕着爱才、育才、发现人才、不举一格选人才、保护有才华的学生等方面，也留下了许

多动人的故事。这是我教育生涯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我人才理念的反映，也是我的一笔精神财富。

自从1992年，我就有意总结这一方面所经历的事情，并建立了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卷宗，以收集部分学生在校学习经验和走上社会后与我的通信以及他们的成功事迹。这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由于许多学生工作经常变动，通信也几度中断，后来又由于我的身体原因，所以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夙愿未能实现。

近年以来，教育界的一些朋友，也包括我的不少学生也向我提出建议，希望我把过去改革中的一些经验总结出来，这是很有价值的，即使在今天对于我国大学的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基于这些因素，我于2004年3月开始着手这本书的撰写，所幸的是得到了许多学生的关心与支持。关于这本书名问题，曾经提出过许多名字，并且与包括易中天教授在内的不少学生进行了讨论，但都觉得不满意。一次我在散步时，突然想到“大学的名片”这个名字，我感到很兴奋，它既形象又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我马上用电子邮件发给易中天教授征求他的意见，他立即回复说：“好，就是这个名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认同了这个名字，认为富有创意，于是书名就这样确定了。

在《大学的名片》中，围绕着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总共写了28个故事。从体裁上，基本上是一事一议，一个故事反映出我的一个人才理念与实践。为什么恰巧是28个呢？总的来说是受到篇幅的限制，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多几个或者少几个，只是我对28这个数字情有独钟，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垣和28宿。所以，28个故事就是天空中的28宿星，这个比拟无疑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在我主政武汉大学期间，毕业的各类学生计有数万人，其中优秀的学生是不计其数的。由于我接触有限，或者缺乏资料，或者失去联系，或者有些人的特殊身份不便撰写，所以收入到本书的杰出人才只是凤毛麟角，对于未能写入到本书的那些成功人士，我谨表示歉意！即使本书没有写到的那些杰出的人才，他们依然是武汉大学的“名片”，是母校的光荣，他们都会载入校史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恢复历史的原貌。

为了准确无误，我请有关的当事人帮助我回忆当时具体事件的细节，或提供了背景资料，稿子写好后，我又将文稿用电子邮件或信函发给他们审查和修改，尊重他们应享有的权利。

当我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少数学生主动赐稿，回忆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其情可佳。为了保持他们的文章风格和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特把他们的文章或诗歌作为附录一并出版。所以，本书实际上是包括两部分：一是我写的28篇文章，约20万字；另一部分是附录，是由11个学生写的12篇文章或诗歌，计3万多字。

为了阅读方便，我把28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编人才难得，第二编改革创新，第三编情意无价。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划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人才、改革创新和以爱心为基础的情意是贯穿于各篇文章之中的。我之所以作如此划分，只是想突出文章的重点，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为他们选择阅读提供方便。书中插排了部分历史的或现在的照片，为的是方便读者对我们师生增加一些形象的了解。

本书虽然是叙述往事，但往事不如烟，即使是在今天它仍然可以使人们从中受到启迪。如是也，这本是我的初衷，也是作者感到最大的欣慰了。

目 录

1 序 言

1 第一编 人才难得

2 一、“他应当上哈佛大学”

——记邹恒甫博士留学哈佛大学的经过

11 二、长空任鸟飞

——我为什么同意田源博士调离学校

23 三、天生我材必有用

——大学生也是教育改革的主力

31 四、决不能杀鸡取卵

——易中天研究生毕业留校的风波

39 五、无私无畏护英才

——赵林是怎样留校当教师的

48 六、兴趣是成才的“核动力”

——转学制度使王小村成为著名的生物学家

55 七、不惟学历重能力

——兼谈我与董辅初先生一家的缘

66 八、宁静致远

——少年大学生刘维宁成才的故事

83 九、山鹰展翅飞

——刘鹰从藏南“农民”到美国经济学博士

91 十、可贵的金牌精神

——彭富春博士成才的曲折道路

100 十一、不拘一格降人才

- 李百炼是怎样成为著名数理生态学家的
- 108 十二、横向成才殊可贵
- 病毒系毕业生葛鸿伟是怎样成为金融实业家的
- 115 十三、徐锋：一个属于未来的自由思想者
- 124 十四、青出于蓝而青于蓝
- 喜看秦金贵博士挑大梁
- 134 第二编 改革创新
- 135 十五、改革的先行者
- 陈天生的创业之路
- 144 十六、一石激起千层浪
- 武汉大学首创插班生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
- 154 十七、勇于争第一的人
- 张在元博士的创造之路
- 165 十八、区人大代表选举的前后
- 朱征夫博士对民主的初步尝试
- 172 十九、热爱教育的女记者
- 谢湘的人生价值的追求
- 181 二十、在快乐学院里成长
- 回顾武汉大学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多学科讨论会
- 190 二十一、一次与大学生的“零距离一次的接触”
- 我与大学生的对话
- 196 第三编 情意无价
- 197 二十二、她给了我们爱
- 我们与干女儿徐鸿博士的故事
- 203 二十三、此情长留成追忆
- 我与插班生的情谊

- 211 二十四、心通道气情转深
——我与王毅忘年交的故事
- 221 二十五、志同道合话教育
——我与学生席隆乾切磋教育问题
- 229 二十六、矢志不移终成才
——魏屹然从旁听生到成功的广告策划专家
- 237 二十七、一份特殊的礼物
——黄晚霞从养鸡专业户到大学生
- 242 二十八、巨星早陨落
——沉痛悼念杨小凯院士不幸逝世
- 252 附 录
- 253 一、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所了解的武大前校长——刘道玉先生(李 为)
- 266 二、我与刘道玉校长(陈加宽)
- 272 三、永远的校长(谢 湘)
- 277 四、校长的亲笔信(傅红春)
- 280 五、润物细无声
——我眼中的刘道玉(文新国)
- 282 六、卞和璞·和氏璧·藺相如(哲 夫)
- 283 七、心中的圣殿(马建勋)
- 285 八、怀念老校长刘道玉(沈德理)
- 289 九、我的求学之路(黄晚霞)
- 293 十、越名教而出自然(王法艇)
- 294 十一、路石
——致刘道玉校长(王法艇)
- 297 十二、祝刘道玉校长七十寿辰(陈松叶)
- 299 后 记



第一编
人才难得

一、“他应当上哈佛大学”

——记邹恒甫博士留学哈佛大学的曲折经过



邹恒甫博士与他在美国的研究生们

2004年10月,《世界商业评论》选出中国最具影响的十大经济学家,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邹恒甫博士名列其中。同年,由人民网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网联举办的“2004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邹恒甫又获得“十大风云人物·建言献策奖”。此前,他于1999年还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于2002年获得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的确,邹恒甫获得这些荣誉是当之无愧的。

他于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世界银行

工作，先后担任贸易政策处青年专家、东欧司青年专家和政策研究司经济学家。十多年以来，他一直活跃在世界宏观经济与公共经济研究领域，承担和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出版和发表了近百种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

他在完成世界银行研究任务的同时，于1991年被聘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于1994年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他还担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系主任，致力于把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与管理经验介绍到国内大学来，以提高国内研究生的素质。

他曾经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让私营经济进入到基础建设领域，以便让更多的公共资源配置到教育、卫生、环境治理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刊物之一，对于加强国内外经济学的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

邹恒甫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除了他的天分以外，还在于他在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的熏陶。

他是武汉大学77级经济系的学生，15岁上大学，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颖好学，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力求组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与西方国家中断了30多年关系后，我国开始向西方国家派出公费留学生，但是数量很少。

1981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部分部属重点大学选拔首批出国留学生，我校是受委托学校之一。那时，出国学习是许多大学生的梦想，他们既把它看作是深造的机会，也是一种荣耀，因此报名者甚众。

邹恒甫是被推荐参考者之一，经过激烈的竞争，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按照美国大学的惯例，申请研究生计划者，需要分别填写5个志愿。恒甫填了美国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校。由于他的考试成绩突出，所以他同时被几所大学所录取，然而教育部却批准他到威斯康星大学

去留学。对此，恒甫当然很失望，但又无可奈何。

1982年春，正值珞珈山樱花怒放之时，经济系系主任吴纪先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十分激动地说道：

“邹恒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也是我系自解放后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他考取了公费留美研究生，可是教育部批准他去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而不让他去哈佛大学，这是埋没人才，真是岂有此理！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我可以给他写推荐信。校长，你应当想办法向教育部汇报，就说是我推荐他去上哈佛大学，希望教育部改变决定，否则我就辞去系主任！”

吴先生是江苏松江县人，说话带着浓厚的下江口音，他说话不仅速度很快，而且很容易激动，甚至有时激动得双手打颤，话都说不出来。对于吴先生的性格，我是略知一点，如果他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事，他就要提出辞职。在我任期内，他多次提出过辞职。为了不让吴先生过于激动，我立即安慰道：

“吴先生，我的心情与你是一样的，无论是从邹恒甫的才华或是办好武汉大学北美经济研究所来说，我都极力主张邹恒甫到哈佛大学去学习，这事我一定据理力争，决不辜负吴先生的一片爱才之心！”

为什么吴纪先教授如此强烈地推荐邹恒甫去哈佛大学呢？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邹恒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人才，爱才之心人人都有，毕生育才治学的吴先生更是爱才如命。吴先生是研究美国经济的著名学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经济系整体搬到襄阳分校，他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文革以前，武汉大学就成立了北美经济研究室，后来提升为北美经济研究所，被列为全国重点学科。吴先生对恒甫的垂爱，是希望他学成后回校接自己的班。二是吴先生早年留学哈佛大学，于1947年获得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到武汉大学工作。他对于哈佛大学是情有独钟，也希望为母校推荐最好的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虽然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生，但是对于两类学生却是比较关注的：一是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学校的名片，是学校的骄傲；另一类是最调皮的学生，有时他们会招惹一些麻烦，常常引起学校的注意，并且成为学校工作的重点。

邹恒甫当然是属于第一类的学生，他在校读书期间，我是知道他的。据他的老师和辅导员反映，他并不是死读书的学生，利用学校实行学分制和宽松的学校环境，他自学和选修了许多课程，如文、史、哲等。所以，他不仅数学、经济学基础理论扎实，而且知识面也很广阔。也就是说，他具有从事高深学问研究所必要的条件，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杰出的人才。

基于吴纪先教授的推荐和我对邹恒甫的直接了解，我决心要为他上哈佛大学而抓紧斡旋。1982年3月初，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首先找到教育部外事局留学生处李处长，向她陈述了希望将邹恒甫由威斯康星大学改派到哈佛大学的理由。可是，李处长一口拒绝了我的请求，她解释道：

“刘校长，现在国家外汇短缺你是知道的，所以只是少量地选派公费留学生。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费是5000美元，而哈佛大学的学费每年是15000美元，也就是说，向哈佛大学派一个留学生等于向其他大学派3个学生。如果把邹恒甫改派到哈佛大学，就要占去其他学校两个名额，这对其他学校和学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应当树立全局观点。”

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决不放弃争取。外事局局长李滔原是我国驻苏大使馆的主管留学生的处长，虽然我在苏联留学时他已回国，但是我被苏联驱赶回国时受到他和蒋南翔部长的热情接待，我们彼此还是熟悉的。于是，我去向李滔局长汇报，再作一次争取。

李滔局长是一位革命老干部，由于他长期做留学生和外事工作，所以思想比较开明，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但是，他在听完了我的汇报后，似乎显得很为难，他向我解释道：

“道玉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不是我不肯帮这个忙，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由于经费有限，如果各校都想把学生派到好学校去，那么今年公派留学生的指标就完成不了。我知道，你是爱才的，不然你就不大会为一个留学生的事到教育部来汇报。我建议你去向南翔部长汇报一下，他也很爱才，如果他批准了你们的报告，计划司就会增加外汇指标，我们就可以把邹恒甫改派到哈佛大学去。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才出这

个主意，但是你们不要向外宣传，否则我们就招架不住了。”

按照李滔局长的指点，通过蒋南翔部长的秘书刘一清的安排，我向南翔部长作了汇报。说来也真是机遇好，一清恰恰是武大经济系的毕业生，是吴纪先教授的学生，对于老师的要求，他肯定要帮这个忙。

南翔部长对吴纪先教授是知道的，他也有意把武大北美经济研究所作为重点学科来抓。因此，关于邹恒甫改派的事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一清的疏导下，很快办完了改派的正式通知。

就这样，恒甫名正言顺地被派到哈佛大学经济系留学。他于1982年6月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1986年获得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5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而，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恒甫是武汉大学校友中的佼佼者，我与他在珞珈山上共同度过了教育改革的大好时光。因此，我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每次回国，总是要到家里看望我，而我也一直关注着他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1986年9月，我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访问，受到了校方友好的接待，参观了该校的教学与科研设施，浏览了美丽的校园。

9月18日晚，代表团一行与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的武大校友聚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我们应邀到哈佛大学留学生吕喆家里做客，他们用自己烹饪的中国菜款待了我们。聚会是从晚上9时开始的，参加者有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斯顿大学等校十多位校友，其中我记得的有哈佛的邹恒甫、杨志、吕喆、刘重持、陈德行等，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徐传毅等。

久别重逢，师生见面，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事。我们代表学校，向留学生们表示了亲切的问候，他们各自也汇报了学习的情况。我们的谈话，是在互问互答双向交流中进行的，其中也有对不同观点的争论。当谈到高兴的时候，不断地爆发出阵阵的欢声笑语。大家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语，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我们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相互握手分别。

那次谈话，我们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教育改革问题，三是关于留学生政策问题。

我记得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当时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围绕着计划经

济、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展开讨论，我国应当采用哪一种经济体制？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也有积极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对此，作为研究经济学的恒甫，观点十分明确，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振兴我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关于教育改革，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一向认为，教育的功能，从根本上说，是启迪知识，开发智力，探索规律，培养智能型人才。然而在我国传统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却是“仓储型”人才。在校学习，由老师往学生大脑仓库里堆装知识，学生毕业了，不过是把货从仓库里提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是如此。这种机械、呆板的教育制度容易窒息人们的独创精神，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成长。中国的落后，归根结蒂是教育的落后，而教育的落后，又是因为教育观念的落后。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首先就是要改革教育；而教育改革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观，变“知识型”人才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我当时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加强综合教育，重视智能的培养，造就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创新的思想是产生变革的动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创造型人才，就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技术，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国民经济。培养尖子人才，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任何一种教育制度，一个学校，如果培养不出有才华的学生，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出色的。我在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放在首位的事，就是设计全新的人才观。按照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思想，我们以武汉大学为实验基地，大胆革新教育制度，设计了有利于创造型人才加速成长的六个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导师制、插班生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我们的这些做法现在已经得到高等院校的普遍认可。

在聚会上，他们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肯定了我校教育改革的这些作法，如实行学分制、提倡导师制、提倡学生自学和独立地科学研究，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他们也十分关心母校未来的发展，希望学校能够成为一流的大学。对此，恒甫也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他介绍说：

“哈佛大学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有名师，如经济系的教授都是世界名流。哈佛大学选聘教师很严格，从全世界范围挑选，他们都是某个学科在世界上顶尖的大师级学者。因此，武大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必须把重点